

# 近代文学改良运动的目标：自由文学

王杏根

资产阶级文学改良运动以戊戌政变(1898年9月)为界限，可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运动的酝酿发动阶段。文学改良只是作为变法维新运动的重要一翼，呈现依附状态，未能独立展开，故文学改良的实际成果并不大。诚如蒋智由所说：“中国数年以来，所谓维新者，尚专属理论之界，而未进入于事实。”<sup>①</sup>而作为变法维新运动组成部分的文学改良运动，真正“进入于事实”，转化为巨大实际成果的，则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文学改良运动进入第二阶段的时候。这时，文学改良运动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不断高涨的新形势下展开的，因而，能以较之第一阶段更为迅猛之势向新的高度发展，从理论建树到创作实践都能取得比第一阶段更为丰硕的成果。

一次有规模的文学革新运动，总能形成一个共同的文学倾向、共同的革新目标。文学改良的共同文学倾向，就是“鼓吹新学思潮，标榜爱国主义”<sup>②</sup>，而共同革新目标，就是为了建设中国式的资产阶级自由文学。蒋智由曾经明确提出：

“按近世纪文化之一大进步，要而言之，谓为‘自由’之所产出可也。盖古代之人，或拘牵于其一国之政治、一国之宗教、一国之风俗，至不敢创一自得之见，发一独到之论，此守旧积习之所由成，而数千年世界之所以无进步，其弊盖坐于此也。然穷久变生，此风渐为人心之所厌弃，而自由之说，遂承其统而代之，因自由而于宗教界、于政治界、于学术界，无不破坏其旧习惯，而开一新面目。文艺亦然，应用自由之一原理，遂得脱去古人种种之窠臼，文艺于是有新生命。不然，谓文章之气运，至古人而已尽可也。伟矣哉！开近世纪之新天地者，一自由神之权化力也。”<sup>③</sup>

蒋智由的这篇议论发表在《新民丛报》，是专为谈文艺而说的；他为文学改良运动指明了最终的奋斗目标，即建设一种资产阶级自由文学。“自由”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一面旗帜，一种思想武器，亦是古代封建社会进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社会特征。建立在反封建专制主义胜利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一切无不在“自由神权化力”支配下，自由政治、自由宗教、自由风俗、自由学术以至文艺也成为一种自由文艺，由“自由之说”而使一切“开一新面目”。文学改良运动所要追求的这种“自由文学”，属于资产阶级文艺范畴。诚如蒋智由所说，是一种“当用其叫唤”“自由、民权、革命、平等以及其他一切新政、新法、新学”的“热的文章”；这种文学“其刺激也强，其兴奋也易，读之使人哀，使

①蒋智由《冷的文章热的文章》。

②《马君武诗稿·自序》。

③蒋智由译《维朗氏诗学论》第二章之按语。

人怒，使人勇敢”<sup>①</sup>。当然，这种资产阶级自由文学是属于近代中国旧民主革命时代的文学，是整个近代反帝反封建新文学的主要部分，是同属于封建时代的旧文学相对立的。

建设资产阶级自由文学，表明近代资产阶级终于有了自己的文学纲领，有了自己的文学指向，从而为资产阶级文学改良运动确立了总目标与总任务。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头一回，获得广大作家的响应。梁启超强调“自由者，精神界之生命也。”<sup>②</sup>又说，“言自由者无他，不过使之得全其为人之资格而已。质而论之，即不受三纲之压制而已，不受古人之束缚而已。”<sup>③</sup>表现了反对封建主义、争取资产阶级人权的意愿。因此，他强调要求获得“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三大自由，皆备于我焉”，并以“自由书”名其著作。无非标榜所作为一种“自由文学”<sup>④</sup>。的确，其《自由书》无当其愧，“每有所触，应时援笔，无体例，无次序，或发论，或讲学，或记事，或钞书，或用文言，或用俚语，惟意所之”，<sup>⑤</sup>具有“脱去古人种种之窠臼”，“开一新面目”的自由文学的特色。文笔格调“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不受箝制于他人”<sup>⑥</sup>，完全摆脱封建旧文学的“箝制”，“惟意所之”地表达他的“本性”，他的资产阶级的利益与愿望。为此，他在他的《新中国未来记》小说中，特别赞扬“拜伦最爱自由主义”这一精神，又赞赏拜伦“兼以文学的精神……助希腊独立，竟自从军而死，真可称文界里头一位大豪杰”，<sup>⑦</sup>把拜伦视作资产阶级自由文学的楷模。于是他译拜伦的《哀希腊》（诗体小说《唐·璜》中的一段）、《渣阿亚（Giaour）》（按：应译作《非伊斯兰教徒》或《不信教者》）两首诗<sup>⑧</sup>，是译介拜伦来中国的第一人。邱逢甲也曾表达了建设这种自由文学的向往：“黄人尚昧合群理，诗界差存自主权。”<sup>⑨</sup>“自主”与“自由”，在他们看来是相通的<sup>⑩</sup>。邱逢甲以为建设起自由文学，可以促使中国人心团结，这同他的“自由钟起国民魂”的诗意一样，呼唤自由文学的诞生。侨居新加坡的侨商、改良派作家邱菽园在为贾兰惜的翻译言情小说《剧盗遗嘱》（香港版）题诗中，同样表达了对建设自由文学的向往：“彩笔生花梦自由，灵源澹出道头头。”<sup>⑪</sup>总之，文学改良运动将为建设资产阶级自由文学而作出努力。从郑观应、王韬等早期改良主义者提出争取资产阶级“文学的自由”，到蒋智由、梁启超等提出建设资产阶级“自由的文学”，说明文学改良运动较之前驱者的文学革新思潮，前进了，深化了，更趋成熟了。文学改良运动之所以能确立目标，集结队伍，因而形成为一个文学运动，是由于具备了必需的阶级基础和必要的历史条件。

那末，文学改良运动前后两个阶段如何为达到其建设“自由文学”的目标，而分别作出不同努力的呢？

在第一阶段，文学改良的主要内容，在“冲决……词章之网罗”<sup>⑫</sup>，在清算封建旧文学“种种之窠臼”与“守旧积习”，在集中力量“破坏其旧习惯”的同时，进行了有限的改革。

例如清算文言文体“语言与文字不相合”，<sup>⑬</sup>的弊害，提出“言文合一”与“崇白话而废

①蒋智由《冷的文章熟的文章》。

②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其二自由与制裁》。

③⑥梁启超《致康有为书》（一九〇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④⑤梁启超《自由书叙言》。

⑦⑧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第四回。

⑨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三十六。

⑩ 梁启超《致康有为书》（一九〇〇年四月二十九日）梁启超说“至‘自由’二字，字面上似稍有语病，弟子欲易之以‘自主’，然自主又有自主之义，又欲易之以‘自治’。‘自治’二字，似颇善矣”。

⑪邱菽园《丁未检校贾兰惜言情译本章回小说为之改编一过并附四诗于后》，《啸虹生诗续钞》卷二。

⑫谭嗣同《仁学自序》。

⑬黄遵宪《日本国志学术志二文学》。

文言”<sup>①</sup>的语文革新主张；清算旧文体即桐城派古文、选派骈文与八股时文的门户家法，提倡报章“新文体”，清算正统诗坛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倾向，提倡“新派诗”；清算传统的文学价值观，提倡“新小说”与“讲实用”、“切民用”<sup>②</sup>的新文学；同时，对历来传统的有关诗古文辞与小说、戏剧的评价，用新的尺度重新审视，表现了反传统成见的革新精神与文学价值观的变化。在此期间，维新派的文学改良工作，破坏多于建设，这对建设“自由文学”的目标来说，是必然的步骤，也是必要的前提。只有首先解除封建旧文学的束缚，才能使“自由文学”茁壮成长。

诚如梁启超所说，“随破坏，随建设”<sup>③</sup>，破坏并非不必要：“实则人群中一切事事物物，大而宗教、学术、思想、人心、风俗，小而文艺、技术、名物，何一不经过破坏之阶级（按即“阶段”之意）以上于进步之途也！”<sup>④</sup>

在第一阶段，文学改良运动处在变法维新运动的高潮期间，维新派集中精力于通过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活动，企图实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的资本主义改革。虽然，他们对封建主义文学作了一定的清算，文学价值观有所变化，文学革新思想有所增强，并在诗文创作方面，出现了“新派诗”和“新文体”；对小说与戏剧的传统观念有所改变，但尚无创作，宣传也不够。文学改良运动虽已初步形成，但未具规模。更由于维新派作家还没有明确文学改良的目标与任务，对自己所追求的资产阶级自由文学的意念，思想朦胧，认识模糊，因此，还不能提出比较明确的系统的理论指导原则或运动纲领，引导并推进文学改良运动独自地有规模向前发展；所以，第一阶段的运动还只能说是处在酝酿发动阶段。

变法维新运动遭戊戌政变而夭折，主要领导人康有为、梁启超出亡国外，继续改良主义政治活动，企图东山再起；同时，继续推进文学改良运动。本来在变法维新运动中处于宣传家地位的梁启超，在康有为支持下，在日本先后创办了《清议报》（1898年）、《新民丛报》、《新小说》（1902年），并在一九〇二年又先后创办了广智书局（上海）和译书局（日本横滨），重建了阵地。

进入二十世纪后，文学改良运动面临了新形势、新局面。一般爱国维新志士，鉴于戊戌变法的失败教训，再加上一九〇〇年（庚子）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和八国联军入侵京、津的刺激，纷纷由“改良”而转向“革命”。民主革命思潮迅速高涨。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发展迅猛。在民主革命思潮的猛烈冲击下，一部分维新派一度受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如梁启超曾考虑同孙中山合作），而一部分倾向民主革命的爱国志士加入了文学改良运动的行列（如蒋智由等）。运动的中坚分子，思想趋向激烈，素质提高了，给运动带来了新的动力。加上社会环境气象日新，如“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sup>⑤</sup>，因而人们的心智觉悟发生新的变化：“然至今日，自由则已知之，民权则已知之，革命、平等以及一切新政、新法、新学，大概亦已知之”，“凡吾民之所未知者而咸使知之，于暗黑之室，而耀之以日火……而人心于是乎一大变”<sup>⑥</sup>。这说明文学改良运动具备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条件和思想基础。所以，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不断高涨的新形势下，在二十世纪头几年，文学改良运动在新的高度与广度上，获得了迅猛发展。

①梁廷樞《论白话为维新之本》。

②谭嗣同《报章总宇宙之文说》（一名《报章文体说》）。

③④梁启超《新民说·论进步》。

⑤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

⑥蒋智由《冷的文章热的文章》。

这一阶段运动确立了以灌输国家思想，推动社会改革，开通民智，培养公德为文学改良的根本宗旨。要求文学“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以国民公利公益为目的……以导中国进步”<sup>①</sup>，把文学纳入推行资本主义改革的轨道；又要求文学成为对国民进行“德育”、“智育”的形象化教材：“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原。”<sup>②</sup>这一宗旨，表明了文学改良运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阶级实质。为了实现这一宗旨，并为建设与繁荣“自由文学”开辟道路，又具体地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曲界革命”的口号和主张，使各个文学部门的革新要求更明确、更具体化，并使之服从文学改良的根本宗旨与建设“自由文学”的总目标。必须看到，这些具体口号是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是在民主革命思潮不断高涨的新形势下，总结了第一阶段文学改良运动的经验之后才提出的。文学改良运动的理论家梁启超，在一八九九年底提出“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的口号与主张。<sup>③</sup>三年后，又提出“小说界革命”与“曲界革命”的口号与主张，<sup>④</sup>并于同年创办发表新小说、新诗、新文体以及鼓吹文学改良的杂志《新民丛报》与《新小说》，作为文学改良运动的中心阵地，而梁启超也俨然成为运动的领袖人物。这是因为，这一时期，梁启超经历了戊戌变法的失败，又一度接受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以为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然初时不可不有所破坏”，并对其师康有为申明：“弟子意欲以抉破罗网，造出新思想自任，故极思冲决此范围，”<sup>⑤</sup>鼓吹反清革命，表现了激进的思想倾向，因此才能在此时提出较激烈的文学革新的口号与主张，行动也较坚决。这对整个文学改良运动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这一阶段的文学改良运动，主要是输入与借鉴欧美、日本等西方资产阶级文学思想与技法，全面展开“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与“曲界革命”，以改良中国文学的素质，从而建设起中国式的资产阶级自由文学。因为那时候，维新派以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sup>⑥</sup>在文学问题上，要改良中国文学以建设自由文学，也就必然要向西方寻找革新中国文学所必需的文学思想、新颖的表现技巧与新鲜的语言，诚如鲁迅所说“求新声于异邦”<sup>⑦</sup>吧。何况，在他们看来，“法国之福禄特尔”（按今译伏尔泰），“日本之福泽谕吉”和“俄国之托尔斯泰”等欧美、日本的文学家“皆有左右世界之力”，所以“敬告我国学者曰：……而不用之何也！”<sup>⑧</sup>梁启超极力主张借用欧美、日本之文学，为革新中国文学及建设自由文学的借鉴。于是，他们在“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曲界革命”的口号下，在各体文学部门提出了可以学习与借鉴的西方文学范本。梁启超提出，诗歌要革新，“不可不求之于欧洲。欧洲之意境、语句，其繁富而诡异，得之可以陵铄千古，涵盖一切”<sup>⑨</sup>；后又强调新派诗“必取泰西文豪之意境之风格，熔铸之以入我诗”，“然而可为此道开一新天地”<sup>⑩</sup>，并指出要以荷马、莎士比亚、弥尔敦、田尼逊（按今译丁尼逊）、拜伦等诗人为诗界革命的楷模。“文界革命”也要求“以欧美、

①②《新民丛报·本报告白》，《新民丛报》第1号。

③梁启超《夏威夷游记》。

④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和《释草》。

⑤梁启超《致康有为书》（一九〇二年五月）。

⑥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⑦鲁迅《摩罗诗力说》。

⑧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

⑨梁启超《夏威夷游记》。

⑩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第四回总批。

日本诸国文体”<sup>①</sup>为法式，提出以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报章政论家福泽谕吉和德富苏峰为典范，并说“德富氏为日本三大新闻主笔之一，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余甚爱之。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sup>②</sup>。所谓“小说界革命”，梁启超也取自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政治小说”的启示，认为“于日本维新之运有大功者，小说亦其一端”<sup>③</sup>，要求借鉴日本的“政治小说”的体制，为“寄托书中之人物，以写自己之政见”<sup>④</sup>。他的《新中国未来纪》小说即效法这种体制与格调。在戏剧革新方面，成效初不如小说与诗文，但也提出以西方戏剧大师为法，“欲继索士比亚、福禄特尔（按今译莎士比亚、伏尔泰）之风为中国剧坛起革命军”<sup>⑤</sup>，并从域外输入话剧形式，演“文明戏”，（穿时装、用地方曲调演唱现实题材的戏曲）改良京剧等。

文学改良运动要创建中国式的资产阶级自由文学，进行“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与“曲界革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运动的中坚人物不能不从欧美、日本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殿堂，寻找现成的蓝图与材料，构筑自己心目中的“新派诗”、“新文体”、“新小说”与“新戏剧”。从这意义上说，所谓梁启超的“文学的革命”<sup>⑥</sup>，或黄遵宪的“无革命而有维新”<sup>⑦</sup>，实质上，其基本点就在于输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文学的“意境”、“风格”、“技法”与“语言”（即外来新名词）等，镕入中国文学的传统体制与形式格调中而已。所以，这种“自由文学”，他们冠以“新”之名，其实是在中国文学的传统模式中，“拿来”西方资产阶级文学的思想与技法，进行有限的改造，因此“自由文学”也仍然是一种“改良的文学”。看起来这是中国文学固有传统与西方文学两者的“结合”，但是，由于他们既不能正确认识中国文学传统之优良所在，又不能正确把握外来西方文学之精华何者适用于我国文学，因此所谓“镕铸”，难免生搬硬套，接受而不消化。尤其表现在创作上，意境、格调、技法和语言未达和谐，未臻完善。不过，由于文学改良运动的这一努力，从此结束了中国文学长期来（除晋、唐时期曾经从域外输入外来民族的文学艺术外）作为“自为的文学”的封闭状态，而促使中国文学由此转变为“开放的文学”，面向世界文学如锦繁花，广泛采撷，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广阔的探索之路。

于此可见，在二十世纪初的开头几年，文学改良运动进入高潮的重要标志是：运动的目标明确，内容扩大，水准提高，成就显著，尤其要紧的一点是运动的队伍扩大了，成分变化了，这一点是造成以上各点的决定性的因素，而且是我们以往研究中未加注意的方面。文学改良运动并否仅仅是改良派作家一派的活动所形成，固然，运动以梁启超等改良派作家为中坚，但其中一部分人其时思想上受到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不能说已转向革命，可以说是更为激进，如梁启超在一段时期内即如此，不容忽视。何况，一部分倾向民主革命的作家如金松岑、马君武、蒋智由（后来参加保皇派的“政闻社”，转向君主立宪派）等在《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杂志上发表文学改革主张，加入了运动。另有一部分民主革命的战士，如陈天华、秋瑾、邹容等的有些见解，尤其是诗文创作，实际上是受到文学改良思潮影响的。陈天

（下转17页）

①梁启超《绍介新书〈原富〉》，《新民丛报》第1号。

②梁启超《夏威夷游记》。

③④梁启超《传播文明三利器》。

⑤《新民丛报》第1号载《新小说》广告《本报之内容》。

⑥梁启超《释革》。

⑦黄遵宪《与严幼陵书》。

过渡措施，可从二方面着手，一是劳动力管理上的松动；二是为劳动力流动创造必要条件。二头齐动，共向劳动力流动这个中间接合点靠拢，一旦靠拢，过渡任务也就完成，劳动力开始流动。

劳动力管理上的松动具体是指大力推行合同工制。国民经济各部门中新增加的劳动力普遍实行合同制，原有职工逐步实行合同制。合同工包括短期合同工（临时工、季节工），也包括长期合同工（聘用工）。同时，逐步疏松就业与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之间的各种联系，合同工与固定工在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上享受同等待遇。

为劳动力流动创造必要条件具体是指逐步使劳动力市场非行政化，并着手扩大这种市场，解除劳动力流动可能带来的失业恐惧感，使社会保障制度与就业分离，让流动的劳动者人人都可得到社会安全、待业、退休保障，使社会福利制度与就业分离，让暂未就业的劳动者不但能享受到就业者的福利，而且还享受到一定数额待业救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基金的来源由劳动者、企业、国家三者共同负担。

过渡措施的实施，需要时间，还需要耗费相当的财力、物力，也许，象价格改革那样，还要付出一定的损失代价，但过渡措施的实施过程，同时也将是促进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发展，促进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社会经济效益提高的过程。

#### （上接42页）

华的通俗小说，秋瑾办的通俗报刊及所撰小说《精卫石》及邹容的《革命军》，至少在文体语言上与文学改良运动的步调一致。即使学者王国维，也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文学改良思潮，他论新学语的输入，表明他是支持文体革新，赞赏“新文体”的。<sup>①</sup>可见，参加文学改良运动队伍的成分较之第一阶段时，发生了大的变化。从而使运动推向了高潮，扩大了成绩和影响。

本来，参加运动的人员，在文学思想与创作上存在共同的倾向，即“鼓吹新学思潮，标榜爱国主义”，又加上对封建旧文学如桐城派古文、选派骈文与“同光体”诗派等等诗文流派，有同仇敌忾、决意讨伐之共同意向，种种旨趣与追求使他们聚集在文学改良运动的战线上，企图实现文学的改革，这是可以理解的。嗣后，由于政治形势发生变化，民主革命运动深入发展，致文学改良运动队伍产生政治上的分歧，造成队伍分裂，运动趋向衰落。一九〇六年，以《民报》与《新民丛报》为对立阵地，民主革命派与改良派就是“革命”还是“保皇”、是“民主共和”还是“君主立宪”等重大问题，展开论战。康有为、梁启超等的保皇面貌暴露，失去爱国青年的支持，政治影响锐减，因而，文学改良运动开始衰退，明显的标志是，《新民丛报》与《新小说》等鼓吹文学改良运动最为有力的杂志先后停办。也由于一部分改良派作家如梁启超等转向君主立宪的政治活动，另办《国风报》，无暇顾及文学改良，而革命派作家大多数都投身到实际的民主革命运动，或出亡欧洲、日本，队伍分散，活动松弛。民主革命熊熊烈火的锻炼，终于使金与石分开。惟一部分以笔墨生涯为主的作家，则创办杂志、报纸，以创作为专业、提倡文艺为志， 在一段时期内，尚能维持着文学改良运动所奠定的文学道路，继续进行文学活动。运动的尾声，可以说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的爆发。

<sup>①</sup>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参阅拙作《从输入外来“新名词”看近代文学“开放型”的特征》一文，载《中国近代文学的特点性质和分期》一书，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月日出版。